

■本期主持: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期主题:20世纪的外国史学

主持人语 20世纪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并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并在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中得到生动的反映。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试图追寻20世纪外国史学发展的踪迹,并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东史学为例,阐述20世纪史学多元发展的特点。

变动中的20世纪外国史学

□ 于沛

放眼当今国际史坛,各种史学思潮和方法涌现,着实让人眼花缭乱。例如,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历史研究中的建构、解构、重构;微观史学、宏大叙事和全球史;历史的认识论、方法论,及以史学理论范式为中心的范型论;解释模式和历史语境;历时时间与历史时间;文化史、新文化史、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的历史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经典文本研究等层出不穷,而这些似都可从20世纪外国史学发展中找到渊源。

英国史家G.P.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堪称世界史学名著。他在书中首先叙述了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的史学发展,最后6章则论述了“国际性的”史学成就,即“古代东方”“希腊和拜占庭”“蒙森和罗马史研究”“犹太人和基督教会”“天主教史学”“文明史”,并没有20世纪史学史必不可少的世界史、全球史。这不是G.P.古奇的疏漏,而是时代使然。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一“结果”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才出现。

20世纪是世界历史巨变的世纪。有研究者认为,这100年对人类的影响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总和。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首要的便是突破了19世纪以国别史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历史的

框架,出现了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史,并在其框架内出现了具有20世纪鲜明时代特征的断代史或专门史,如“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全球史学”等。这样,人们今天在谈及20世纪外国史学发展状况时,才会在“世界的”或“全球的”视阈下展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推进到电气时代。恩格斯说,“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这不仅是科技革命、生产力革命,也是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为新生产关系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史学也正是在此时,举起“史学革命”的旗帜走上了20世纪。1912年,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将其新著命名为《新史学》,意在公开挑战传统史学,强调史学不是停滞不前的学问,而需随着社会和科学的进步追求新求异求变。1929年1月中旬,法国著名的《经济与社会年鉴》(现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在新史学的浪潮中问世,以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等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力主打破实证主义史学的局限,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辟了道路。在新史学的基础上,家庭史、儿童史、书籍史、阅读史、想象史等方面成果卓著,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如

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口史学、心智史学、心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与此同时,以过程叙述为主的史学,逐渐为注重理论阐释性的史学所代替。

在20世纪历史上,1900—1918年被称为“旧世界体系崩溃”的时代。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大战导致欧洲衰落,欧亚封建帝国瓦解,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仅暂时调整列强均势,并未平息列强之间的矛盾与争斗,反而使资本主义世界酝酿着更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191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后,几近使资本主义遭灭顶之灾,此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展势头良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迅速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波兰、中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如英国E.J.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强调“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并且在世界史坛的影响迅速扩大。如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所言,“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疑

明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没有唯心主义史学家任意挑选来作为标准的‘诸如自由、个性、民族和宗教等乱糟糟的主观主义概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以百计的民族独立国家诞生,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发展中国家开始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关系到世界全局的重要的政治力量。1955年,巴勒克拉夫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撰写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最先提出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来,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一般认为,这是全球史观的滥觞。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问世。他的观点与巴勒克拉夫一致,即“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在他看来,殖民体系瓦解、数以百计的新兴国家的诞生,无疑是新世界到来的标识,新世界催生了新的《全球通史》。这部著作之所以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主要在于它的“全球性”。如阐述公元500年之前的古典文明时,没有遗漏中国和印度,也不是一笔带过;阐述20世纪

文明时,儒家文明是独立一章,此外还有专门篇章研究西方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在对1500年以后世界的研究中,作者较深入地探讨了全球统一性的开始、全球统一性的巩固。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及两次世界大战,作者强调的均为“全球性影响”。这在当时西方世界通史性著作中,是很少见的。

从19世纪民族国家的历史,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史,再到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史,“民族国家”“世界”“全球”并不仅仅是历史研究单位的转变,更是二战后世界政治版图的改写。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这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在西方学术特别是历史学的语境中,“世界”这一概念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根深蒂固,有其特定的内容。近代以来西方的世界史,只是古代希腊、罗马,以及欧洲、北美的历史。这种偏见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所改变,但彻底肃清其消极影响,尚需时日。

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在其自身繁荣发展的道路上,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精华,自然要借鉴20世纪外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切有益内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择其善者而从之,是我们长期的现实的任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际遇与“文化”转向

□ 梁民侠

英国作为最早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既是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重镇,也是20世纪史学流派迭出与学术思想多元的国家。

20世纪英国史学格局呈现出的内涵特质与学术景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50年代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出现史学流派与学术思潮的嬗变。以社会史家乔治·屈维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史学,以政治史家刘易斯·纳米尔的保守主义史学,以经济史学家乔治·科尔和理查德·托尼为代表的工党史学,以阿诺德·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等流派,各领一时风骚。二是六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话交锋中,逐渐发生了方向性转变,取得了阶段性进步。同时,20世纪英国史学的跨学科特征不断得到强化,新史学理论、新史学方法与新学科领域不断产生。剑桥大学“历史人口与社会结构研究小组”的彼得·拉斯莱特等人开创的历史人口学派与堪称主流的经济社会史学派并驾齐驱,昆廷·斯金纳倡导政治思想史的“剑桥学派”风头强劲,微观叙事史与新文化史学不分伯仲,英国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异军突起,勾画了战后英国新史学思潮的复杂景观。三是专业期刊、史学机构与学术流派交互涌现、齐头并进,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全国性史学机构有“英国历史协会”和“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同时《英国历史评论》《激进历史评论》《新左派评论》《过去与现在》《今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评论》《历史工作坊杂志》等期刊创办发行,成为发表学术著述和传播史学观念的重要载

体,促进了20世纪英国史学的变革与学术流派的演进。

在20世纪英国诸多史学流派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仅在于其著史范围宏阔,著作形态多样,也不唯在于史家群体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相一致,更在于面对共同或不同的学术批评者时,群体史学不断调整史学宗旨和更新学术方向,运用史学反思的恰当理念,通过史学实践的文化路径,进行了持续不懈的专业化回应。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致可分为两代史家群体。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英国产生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其中,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系列著作,展示了世界体系建构的史学实践方式,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的大众化叙事魅力。爱德华·汤普森侧重阶级构成的文化解释模式和底层叙事研究,彰显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批判性发展与文化反思态度,大有引领后来者的文化史学实践意义。

作为战后英国史学界的新生力量,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成长的:有的如拉斐尔·萨缪尔那样通过参与新“左派”运动、女性主义运动与社会思潮建构的实践方式,以著书立说进入职业史坛而崭露头角。有的如希拉·罗博瑟姆那样追随六七十年代新社会文化史学的学术动向,通过参与“历史工作坊运动”而声名远播,对70年代以来英国女性主义史学复兴及实践传播作出了贡献。有的如佩里·安德森那样触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或者从新“左派”理

论、政党政治、文化批评和社会形态的角度,出版了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系列著述;或者从社会现代性到现代性的理论出发,反思社会历史与现实诉求,发表了聚焦于文化源流、历史思想与英国特性等主题的大量论著。

在20世纪30—90年代英国的时空范畴内,“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变迁”的阶段特征鲜明,既体现了由党派史学向科学史学转变、学术政治化走向学术思想化的历程,又昭示了史学观念的更替性和史学实践的连续性:第一,学派形成阶段(20世纪30—50年代)。该阶段既是群体史学观念的生成与发轫时期,又是建立学术规范的酝酿时期,史学范式实现了由经验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嬗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萌芽勃发期。该阶段的史学实践表现了党派史学意识形态取向逐渐淡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取向则越发鲜明,也呈现了英国传统劳工史学转向经济社会史学的学术进步与发展路径。第二,学派发展阶段(20世纪60—70年代)。该阶段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范式日渐成熟时期。在传统劳工史学的基础上,劳工生存状况重新成为重点关注对象,激进史学传统与新劳工史学范式深度融合起来。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倡导从社会经济史转向英国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的“文化”分析传统,文化批评意识日益凸显。第三,学派转型阶段(20世纪80—90年代)。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渐趋沉寂与复苏时期。第一代史家群体在与第二代史家群体展开社会批判与学术论争的史学境遇中,在70年代后欧美解构主义思潮的背景下,重新

寻找史学变革的内在力量,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及新文化史学研究。第二代史家群体则在英国史学“文化”转向中重新调整学术领域,赓续汤普森等人倡导史学“文化”转向的思想遗产与实践成就,展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文化特征的路向。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经由传统劳工史、经济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文化”转向,反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西方“新社会史”及“新文化史”的理论贡献及实践成效,表露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段性特征及研究进路。在后现代主义挑战、社会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下,霍布斯鲍姆重视从社会结构理论与历史文化结构的历史考察,既通过对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撰写大量的史学理论文章,反映了其对待历史文化的立场与态度,又出版了《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社会与文化》等多部具有文化史取向的著作。霍布斯鲍姆的论著聚焦全球历史意识、时代精神现象与历史文化变迁,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的文化实践风格。汤普森对于黑人奴隶制与社会结构的文

化解释相映成趣。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堪与娜塔莉·戴维森和勒华·拉杜里等颇具特色的文化史阐释媲美,共同夯实了新文化史范式的学术基础,佐证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转向与史学意义。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左派历史语境中E.P.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编号:17BSS006]的阶段性成果)

横亘中东沙漠和高原的漫长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犹太文明和波斯文明,重视史学研究是这些文明的显著特点。20世纪前的中东史学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前伊斯兰时代史学,主要有王表、王室年鉴和传记,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王表》、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都灵大纸草、犹太人的《列王记》等,其特点是神人不分,没有完整的历史情节,历史认识较为粗浅,被称为“准史学”或“原史学”。二是伊斯兰史学,始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其原型是诗史和谱系,如圣训和史记。13世纪拉施特历时十年编写的《史集》,是篇幅浩繁的历史百科全书,被誉为中东地区第一部世界史;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更是世界史学史中的瑰宝。三是民族认同史学。18世纪末,随着中东诸帝国的衰落、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影响,民族认同开始成为中东史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19世纪的伊朗史学家强调《波斯古经》的历史意义,将祇教的神话恢复为伊朗人自己的神话,代表了现代伊朗的民族精神。

步入20世纪后,中东地区的民族自觉意识进一步迸发。中东的历史学家以伊斯兰文明为基调,寻觅与现代性的结合,通过史学写作颂扬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利益,把中东民族认同史学推向了另一高潮。与此同时,中东史学在继承前人、吸收西方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在史学编撰、史学研究领域、专业历史学家等方面均有所发展,重点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政治编年史和区域国别史的编撰。埃及历史学家艾哈迈德·沙菲克撰写了10卷本的《埃及政治编年史》,以时间为序,记录了埃及自1914年到1930年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该著作是研究20世纪初埃及政治编年史的经典之作。黎巴嫩历史学家阿萨德·鲁斯图姆整理的《埃及国档案》,根据时间顺序收集了从阿齐兹·穆罕默德·阿里开始的埃及历任国王档案,为研究相关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国别史方面,沙特阿拉伯历史学家艾哈迈德·雅欣·希雅利主编的《古今麦地那风貌史》,记录了麦地那的历史遗迹、宫殿、清真寺、居民、山脉、水井及其历史事件演进轨迹,是麦地那区域史的经典作品。伊拉克历史学家阿纳斯塔斯·卡尔马里的《伊拉克简史》,论述了伊斯兰教出现前后伊拉克的历史以及幼发拉底河周边的地理环境,是伊拉克国别史的代表著作。

第二,百科全书式史学工具书的涌现。埃及历史学家爱敏·马赫迪的《尼罗河年鉴》,是一部介绍埃及政治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作者以尼罗河泛滥为主线,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埃及历史上的统治者们在其任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和阐释。埃及历史学家阿齐兹·苏尔雅勒·阿蒂亚主编出版了八卷本的《科普特百科全书》,250多位西方和埃及学者参与撰写,内容涵盖埃及科普特人的历史、神学、语言、艺术、建筑、考古学和人物传记等,是研究科普特人的必读之作。

第三,研究领域的拓展。受西方史学的影响,除了传统的政治编年史,20世纪的中东史学研究还包括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民族史等方面的内容。伊朗史学家侯赛因·皮亚尼亚通过考古学、铭文学和钱币学的研究方法,论证波斯文明的伟大。被称为“埃及历史之父”的开罗大学教授穆罕默德·艾尼斯,主要研究埃及和资本主义产生问题。伊拉克历史学家阿纳斯塔斯·卡尔马里出版了《阿拉伯货币与钱币学》,介绍了伊斯兰货币形态及钱币体系的历史流变,弥补了中东经济史研究的不足。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尔·伊纳尔哲克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关注农场主在奥斯曼帝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土耳其历史学家齐亚·格卡尔普将土

耳其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土耳其人曾经居住过的中亚和南亚地区,并且关注土耳其历史上法律、制度、民俗和文化的发展。妇女史是中东史学发展较快的领域,中东史学家研究妇女财产拥有和社会地位等问题。

第四,出现受过系统训练、具备专业素养的学院派史学家。学院派史学家一般在英国或法国获得博士学位,更加注重运用政府档案等一手资料,力求客观公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穆罕默德·沙菲克、古尔巴在英国留学,师从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并获得博士学位,是埃及第一代学院派历史学家的典型。1928年,他用英文写成并出版了《埃及问题的开始与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被誉为现代埃及史学的“里程碑”,标志着埃及史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两位重量级的学院派史学家——穆斯塔法·卡米勒和穆罕默德·法里德,他们首倡用文化学的方法认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二人前往欧洲收集档案和官方文献,许多观点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第五,移民历史学家的贡献与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中东民众移民到西方国家。在西方的中东研究中,有一些著名历史学家是这些移民的后代,被称为移民历史学家。乔治·宰丹是贝鲁特人,除母语阿拉伯语外,还掌握了德语、法语、英语、叙利亚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等。1902—1906年,他出版了五卷本的《伊斯兰文明史》,这是一部史料翔实的伊斯兰文化史专著,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爱德华·赛义德是移民历史学家中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耶路撒冷,大部分时间在埃及长大,在美国迎来了学术生涯的高峰期。其代表作《东方学》,有力推动了中东研究新方向的形成。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和新历史条件下,20世纪中东史学较以前有了较大进展。中东史学家把具体研究领域同社会历史变动紧密结合,研究领域不断革新,研究成果贴近时代,但也存在着对民族认同的过分颂扬,在历史叙述中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在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下,中东史学同西方国家各种史学观念进行对话与交锋,史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基本取向。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世界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654 邮箱:gmbjsj@163.com